



环球时报：您为何长期致力于向外界讲述中国的扶贫减贫故事？

库恩：中国在消灭绝对贫困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是打破外界对中国成见的最好故事。中国提出在2020年底前消除国内绝对贫困，并系统地实现这一目标，这凸显了中国强大的执行力。在过去的30年里，尤其是过去15年里，我与我的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一起，到中国的100多个城市以及无数个县、乡、村进行调研和制作纪录片。尽管我认为自己很了解中国，但直到我开始在偏远的山村实地考察后，才意识到扶贫所需要的一切。我有机会与贫困村民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有些人通过创建微型企业摆脱贫困；有些人被异地搬迁到城市郊区；还有那些生病或体弱，不断获得社会帮助的人。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仿佛我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踏上摆脱贫困之旅。无论中国经济

“我看到被问责的官员汗流浹背”

有多大的增长，无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得多高，在外界看来这部分人的贫困非常难以解决。同样令我惊讶的是，当时很多中国城市的居民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农村地区正在进行的扶贫工作，特别是“90后”和“00后”。在我与这些年轻人，包括出生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交谈中，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乡镇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致力于向全世界，包括中国讲述中国的扶贫减贫故事。

环球时报：《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这部纪录片在拍摄过程和播出后，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库恩：2019年7月31日，我撰稿并主持的这部专题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南加州电视台播出，这是第一部在海外播出的关于中国扶贫行动的深度纪录片。2020年5月，它再次在美国播出。纪录片通过6个案例，对中国的扶贫战略、实施扶贫所需的制度和组织进行细

致入微的描述。例如，村民可以在脱贫致富民主评议会上决定哪些人是贫困人口、哪些人已经脱贫了。官员可能不知道全部真相，但村民知道彼此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曾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偏远村庄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村民投票将一位父亲患有癌症的年轻人列为贫困人口，并为另一个人摆脱贫困而欢呼。

我还惊讶地发现，地方政府为每个贫困家庭建立档案，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脱贫计划——这是数百万贫困家庭的“定制”计划啊，每个月都要检查、记录，供中央汇编和分析。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很多年轻的党员干部被派往贫困村开展扶贫工作两年。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很兴奋，因为知道自己正在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国家承诺作出贡献，而且他们的基层工作也将有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我还观察过中国为扶贫进行的搬迁工作，参观过相关的职

业培训。

中国扶贫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第三方评估”制度。由于第三方评价者来自完全不同的区域，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将要被评估的官员，因此不会被个人关系所左右。例如，我们的纪录片聚焦重庆市西南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团队。他们像在执行军事任务一样，从大学出发深入农村，任务就是评估减贫进程中的成效和问题。有的评估小组经常进行“突然袭击”，到达目的地后，数以百计的评估人员就分散到村子里，检查扶贫工作是否到位。在一个民族乡，评估组成员发现工作中存在违规行为，我看到当地官员被问责时真的是汗流浹背。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还有很多人对中国有负面情绪，我们的纪录片旨在通过描绘中国扶贫工作如何运作，来打破这些人对中国的某些偏见。在看完我们的纪录片后，有美国观众说：“在观看之前，我没有期待一个积极的结果。因为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太多了，以至于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关心中国下层民众。但看完这部片子，我的看法改变了。”▲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精准扶贫，打破对华成见的最好故事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张梦旭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一个特写故事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长期关注中国扶贫减贫话题，他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发出这样的感慨，称赞“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史诗般的成就”。77岁的库恩先生30多年来一直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他出版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等著作，并在前些年深入中国贫困地区，制作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通过“嵌入式”的考察和拍摄，库恩对中国“有针对性”的扶贫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整个中国作出的扶贫承诺和强有力的执行力都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参考。（右图为库恩博士提供的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代京村考察扶贫工作时的照片。）



成功在于整个国家的承诺和执行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库恩：首先是精准扶贫。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主席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他指出，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忌空喊口号。“有针对性”就是要有个性化的程序和方案，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包括标准化的贫困定义、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以及量身定制的脱贫计划。其次，超越扶贫本身的大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使扶贫工作完成其使命，可以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能力。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那些惊叹于中国如何以比其他地区和国家少得多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美国人，我也告诉他们，中国赢得抗击疫情斗争、赢得消除极端贫困的斗争，其共同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我认为，这基于三个强有力的原则：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只是发布指示和声明，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书记”直接负责和推进扶贫工作。我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向谁表演，而是真正把扶贫作为自身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第二是中国领导人的承诺。在习近平主席几乎每一次国内视察中，他都会重点了解当地的贫困状况和正在采取的扶贫措施。他还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专题会议，每一次都围绕一个主题，分析问题、研究战略、部署新方案。这样的会议对于制定解决扶贫工作不同阶段问题的方案是有效的。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领导人能作出这样的承诺。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19个省份对口支援

湖北的地市，这也是东部和西部省市之间采用的扶贫长期战略。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环球时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什么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库恩：这是因为中国的扶贫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中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已完成，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

世界可以从中国的扶贫成功中学到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因此对于中国的扶贫经验必须经过转化和适应。中国扶贫经验的价值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一是方法论；二是措施，包括根据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方式（如个人微商、社区微产业、教育、搬迁、社会保障等）；三是落实，特别是需要的层级组织机构；四是评估，建立一种监测、衡量和调整扶贫政策、制度和官员的独立方式，强调问责和诚实。此外，一个国家的扶贫工作要想取得成功，国家领导人必须作出坚决的承诺。所以说，中国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承诺和整个国家的执行之上的。

环球时报：能具体谈谈中国的扶贫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参考价值吗？

库恩：贫困是人类社会和各国的顽疾，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人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关心贫困人口是一个有价值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标志。我曾与在中国研究扶贫的非洲研究生进行过交流，他们对我上面说的那些要素都很感兴趣，尽管他们认识到这些，但由于各自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实施扶贫计划和评估扶贫效果方面存在困难。我也非常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贫困状况，在这些国家，中国发展微型企业和提供小额贷款扶贫的经验是直接适用的。▲

环球时报：近距离观察中国30多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库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40多年的卓越发展，也是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经历的史诗般变革故事。30多年来，我有幸亲身近距离见证这一转变过程。这让我想起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我说的话。他强调，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成就有一个谨慎的评价，既不过高也不自满，而应该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是一个持续不懈的过程。

的食物供应、医疗保健和教育设施及其便利程度等。对于这些非定量的标准，中国最近都取得实质性进步。我们强调“绝对”一词，在中国，没有人声称国家已消除所有的相对贫困。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立即转变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我认为，这是一个几十年的愿景，中国的官员不应制定不切实际的短期时间表，而是要做一些可持续的项目。

已脱贫的人会面对一些现实问

“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庆祝历史性地消除所有绝对贫困这一不朽成就的同时，中国领导人立即又着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农村和农民是国家的“压舱石”，作为这一新发展阶段的例证，中国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以保持农村地区发展势头。中国脱贫攻坚也是史诗般的成就，过去70多年间，新中国成功实现8.5亿人摆脱贫困，其中包括在过去8年里近1亿人摆脱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它将被永远铭记。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一个特写故事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

环球时报：最近也有些国际舆论提到“中国目前的扶贫标准是否低于国际贫困标准”，还有的关注“中国是否面临返贫挑战”。对此，您怎么看？

库恩：我认为，中国的贫困评估标准更为复杂，不能严格地根据相对可支配收入来衡量，还必须包括其他非量化措施，如充足和可靠

题，比如疾病和健康原因是否会让人重新陷入贫困。这些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有政策和机构来持续不断地帮扶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此外，我刚才提到，我最关心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包括留守儿童。我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相处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上海，他们和普通市民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中国的大城市和工厂是改革的引擎，这些实际上是在建立在进城务工人员长期辛勤劳动的基础上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建议，中国要解决地域和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失衡问题，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互联网向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远程教育，尤其是在小学和中学。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让全国的教育更加平等，中国可以为下一代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立刻完成，那当然很好，但如果必须作出取舍，为所有中国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